

《淮南子》论管仲及其思想内蕴

高 旭

(安徽理工大学 楚淮文化研究所,安徽 淮南 232001)

摘要:作为秦汉道家的重要论著,《淮南子》对管子有着多方面的思想认识,表达出由衷的尊崇之情,将其看作春秋时期的政治伟人之一。虽然《淮南子》对管子生平所言不多,但无论是对管子之功,对管子之才,还是对管子之思,都是极为推重,赞赏其忍辱进取、兴国为民的政治精神,称扬其尊王攘夷、佐桓兴齐的政治功业,视之为“贤相”楷模。立足黄老,《淮南子》论管与儒、法家有异,彰显出鲜明的道家精神,并试图借鉴管子兴齐的政治经验,探求西汉王朝的长盛之谋。

关键词:《淮南子》;管子;管仲;黄老道家;齐文化

中图分类号:B234.4 **文献标识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006-6152(2013)06-0126-05

在秦汉思想史上,《淮南子》立足黄老,试图备“帝王之道”,接“人间之事”,究“天地之道”(《要略》)^[1],从中探求西汉王朝的长盛之谋,促其稳定发展。在《淮南子》看来,西汉王朝的求“治”之道,应以史为鉴,能从先秦时期成功的政治经验中有所借鉴,而管仲相齐、桓公称霸即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。“管仲免于累继之中,立齐国之政,九合诸侯,一匡天下”(《汜论训》)。《淮南子》认为,桓公时期齐国之所以能摆脱内忧,走向强盛,根因在于重用管仲为相。正由于管仲治齐有法,“其为政也,善因祸而为福,转败而为功”,能“通货积财,富国彊兵,与俗同好恶”^{[2]2132-2133},所以齐国最终复兴于春秋之际,桓公也成为“五霸”之首。基于此,对管仲之于齐国政治的特殊作用,《淮南子》在思想上高度肯定和评价,而对管仲其人,也十分尊崇。就历史文化而言,《淮南子》论“管”,反映出齐文化对其深远的历史影响,而且因其深受西汉黄老思潮熏染,所以在秦汉时期别具特色,具有一定的代表性。

一、论“管”之功

管仲相齐、桓公称霸,这是春秋时期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,也是齐国政治史上的里程碑。正是基于管仲改革的积极作用,桓公之时的齐国一跃成

为西周东迁后,最富现实影响力、号召力的政治大国。也由此,管仲成为先秦时期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,为当时及后世政治家、思想家所时常称道。孔子曾言:“管仲相桓公,霸诸侯,一匡天下,民到于今受其赐。微管仲,吾其被发左衽矣”(《论语·宪问》)^{[3]2132},对管仲在春秋时期所建立的政治功绩,给予高度肯定和颂扬,认为其不仅能佐桓公,霸诸侯、匡天下,而且能攘夷狄、安百姓、存文脉,使华夏民族免于“被发左衽”之灾。到秦汉时期,这种对管仲的推崇之意、赞扬之情,仍能在许多思想著作中可以看到,而且与孔子相较,更显示出时代化的独特认识,发散出浓厚黄老精神的《淮南子》即是其一。

在《淮南子》中,管仲屡被提及,被视为先秦时期的政治伟人。若具体而言,《淮南子》对管仲的思想认识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:

第一,涉及管仲的人生经历。一是早期管仲的政治发展,“管仲辅公子纠而不能遂,不可谓智”(《汜论训》),“伊尹负鼎而干汤,吕望鼓刀而入周,百里奚转鬻,管仲束缚,孔子无黔突,墨子无暖席”(《修务训》),“管子以小辱成大荣”(《人间训》)。在管仲的一生中,从“辅公子纠”到辅公子小白是其转折点。在齐国内政发生重大变化、君位继承权处于激烈斗争中的时候,管仲起先并未选择后来的桓

收稿日期:2013-09-01

基金项目: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“《淮南子》与法家思想研究”(2011sk142);安徽省社科联项目“《淮南子》与其成书背景的互动研究”(B2012001)

作者简介:高旭,男,陕西延安人,安徽理工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讲师,楚淮文化研究所所长,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。

公(公子小白),而是跟随公子纠。甚至在政争中,曾与桓公发生过激烈的冲突,重创过后者。这使得桓公成功即位后,对管仲深为痛恨,必欲杀之而后快,也因此使得“管仲束缚”,被囚运回齐国。可以说,这段经历是管仲政治生涯之低谷,几乎让其丧失生命,更遑论仕途。在《淮南子》看来,管仲的这段人生坎坷、屈辱经历,非但不损其伟大,相反,所谓“艰难困苦,玉汝于成”,这正是其终为“圣人”之基础,值得肯定。二是管仲与鲍叔牙的政治交谊,“无管仲、鲍叔以为臣,故有豫让之功”(《道应训》)。在先秦史上,管、鲍之交是著名的政治佳话,被视为知人举贤的典范。正因有着鲍叔牙的相知,以及在困难中的竭力相助,管仲才为桓公所谅解和信任,最终施展雄才,兴盛齐国。

第二,涉及管仲的政治功业。一是辅佐桓公,成齐霸业。“管仲免于累继之中,立齐国之政,九合诸侯,一匡天下。使管仲出死捐躯,不顾后图,岂有此霸功哉!”(《汜论训》)“文王举太公望、召公奭而王,桓公任管仲、隰朋而霸”(《泰族训》)。《淮南子》认为,桓公之时的齐国之所以能“九合诸侯,一匡天下”,这与管仲之力密不可分。反之,对管仲而言,由于其竭心尽力辅佐桓公,成齐霸业,所以才能成为举世闻名的政治家,建立自己在春秋之际的显赫功业,名传青史。二是攘除夷狄,护卫华夏,“管子忧周室之卑,诸侯之力征,夷狄伐中国,民不得宁处,故蒙耻辱而不死,将欲以忧夷狄之患,平夷狄之乱也”(《泰族训》)。《淮南子》认为,管仲能在春秋时期,凭借齐国的政治实力,解决“夷狄伐中国,民不得宁处”的现实问题,最终“平夷狄之乱也”,这是其难能可贵的政治业绩,值得赞扬。

第三,涉及管仲的政治评价。在齐国史上,管仲与晏婴虽时代不同,但都为一名相,为后人所称道。所以,管、晏相提,这在《淮南子》为常见,如“执术而御之,则管、晏之智尽矣”,“景、桓公臣管晏,位尊也”(《主术训》),“从管、晏视伯夷,则戇矣;从伯夷视管、晏,则贪矣”(《齐俗训》)。此外,《淮南子》有时也将管仲与百里奚并论,“管夷吾、百里奚经而成之,齐桓、秦穆受而听之”(《繆称训》),“百里奚转鬻,管仲束缚”(《修务训》)。百里奚是春秋时期秦国著名的政治家,生平经历与管仲相仿,都遭遇过坎坷困窘,但最终也有幸为秦穆公所赏识,任以治秦,促成穆公之时秦国的强盛。由此可见,不论是管、晏,抑或管、百,实际上都被《淮南子》视为先秦

时期的贤相楷模,充分肯定其政治功绩与历史地位。

第四,涉及管仲形象的政治文化意蕴。“故管子文锦也,虽丑登庙;子产练染也,美而不尊”(《繆称训》)。《淮南子》认为,管仲虽然在生活上有奢侈之嫌,但因其有功于国,所以盛名不为瑕疵所掩。《淮南子》还批评那些“丑必托善以自为解,邪必蒙正以自为辟”之辈,认为这些人“行无廉耻,辱而不死,曰管子之趋也”(《泰族训》),尽管其言行可鄙,却喜欢与管仲相比,给自己的不当行为寻找借口。“于是百姓糜沸豪乱,暮行逐利,烦拏浇浅,法与义相非,行与利相反。虽十管仲,弗能治也”(《齐俗训》)。在政治上,《淮南子》虽然推重管仲的杰出才能,但认为如同统治者“以其知巧诈伪,饰众无用,贵远方之货,珍难得之财,不积于养生之具”,那就算是“十管仲”,也无法真正有效治理国家。实际上,在《淮南子》这些论“管”之言中,显示出管仲已形成特定的政治文化形象,成为人们在政治上或生活中时常提及,甚至比附的历史对象。

此外,《淮南子》中还有直接涉及《管子》一书之处。一为引《管子》之言以明事理,“物故有近之而远,远之而近者。故大人之行,不掩以绳,至所极而已矣。此所谓《管子》‘泉飞而维绳’者”(《道应训》)。《淮南子》认为人们在现实中,不论如何行事,其结果都在于实现预期目的,这正如鸟儿的飞翔虽无确定方向,但最终都归于栖息之地。二为论说《管子》之书产生的历史缘由,“齐国之地,东负海而北障河,地狭田少,而民多智巧,桓公忧中国之患,苦夷狄之乱,欲以存亡继绝,崇天子之位,广文、武之业,故《管子》之书生焉”(《要略》)。客观而言,虽然《淮南子》中直接谈及《管子》仅此两处,但实际上后者在思想上对《淮南子》具有深远影响,是《淮南子》思想体系得以构建的重要理论资源之一。

总之,对管仲在齐国政治史上的重要作用及地位,《淮南子》有着深刻认识,而且给予积极的历史肯定和评价。因此,在《淮南子》中,管仲备受推崇,被视为尊君之能臣,兴国之贤相,在很大程度上,成为《淮南子》所憧憬的政治伟人形象。

二、论“管”之才

在思想上,《淮南子》“纪纲道德,经纬人事”(《要略》),试图推动西汉王朝走向“通治之至”(《本经训》),因此尤为注重总结和反思先秦时期的政治经验,从中探求较为理想之“治道”。管仲治

齐,佐桓公称霸,这在春秋政治史上,是尊王强国的历史典范,对《淮南子》而言,非常值得镜鉴。基于这种认识,《淮南子》在论及管仲时,多有颂扬,表达出由衷的推崇之意,甚至以“圣人”称之,认为其兴盛齐国的政治成就堪为“霸功”。实际上,作为“贤相”楷模,不论是政治精神、政治实践,还是政治文化上,管仲都彰显出独特的历史内涵,其强烈的求治意识与事功精神对《淮南子》产生深远影响。

首先,对管仲忍辱进取、兴国为民的政治精神,《淮南子》深为认同和赞赏。

“管仲辅公子纠而不能遂,不可谓智;遁逃奔走,不使其难,不可谓勇;束缚桎梏,不讳其耻,不可谓贞。”《淮南子》认为,如果就世俗而论,管仲在其早期政治生涯中,难逃不智、不勇和不贞的严厉指责,只能是“布衣弗友,人君弗臣”。但《淮南子》对此并不认同,反而强调“今以人之小过,掩其大美,则天下无圣王贤相矣。故目中有疵,不害于视,不可灼也;喉中有病,无害于息,不可凿也”,认为正由于管仲能“以小辱成大荣”(《说林训》),在逆境中不忘进取,所以才能最终“免于累继之中,立齐国之政,九合诸侯,一匡天下”,若“使管仲出死捐躯,不顾后图,岂有此霸功哉!”(《汜论训》)

“夫圣人之屈者,以求伸也;枉者,以求直也;故虽出邪辟之道,行幽昧之途,将欲以直大道,成大功。”《淮南子》认为,管仲之所以能忍辱进取,是因为“忧周室之卑,诸侯之力征,夷狄伐中国,民不得宁处,故蒙耻辱而不死,将欲以忧夷狄之患,平夷狄之乱也”(《泰族训》),有着拯济斯民、解国之难的政治抱负。换言之,管仲之忍辱,并非仅为一己之私利,而是如孔子那样,“欲行王道,东西南北七十说而无所偶,故因卫夫人、弥子瑕而欲通其道。此皆欲平险除秽,由冥冥至炤炤,动于权而统于善者也”(《泰族训》)。由此,《淮南子》认为,“管仲束缚”,忍辱以成功业,根本上体现出“圣人不高山,不广河,蒙耻辱以干世主,非以贪禄慕位,欲事起天下利,而除万民之害”(《修务训》)的崇高政治精神,值得世人钦佩。

其次,对管仲尊王攘夷、佐桓兴齐的政治实践,《淮南子》极为肯定和称扬。

在管仲的积极辅佐下,齐桓公不仅稳定自己在齐国的政治基础,巩固君位,而且“三举而九合诸侯”(《主术训》),成为春秋时期最具影响的政治家,取得诸侯之盟主的重要地位。春秋初期,随着“周室

之卑,诸侯之力征,夷狄伐中国,民不得宁处”,原有的以周天子为核心的政治秩序走向动荡、衰落。正因如此,管仲因缘际会,在得到齐桓公的信任后,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,“修旧法,择其善者而业用之”(《国语·齐语》),“俗之所欲,因而予之;俗之所否,因而去之”(《史记·管晏列传》),从政治、经济与军事诸方面推动齐国迅速发展。基于此,齐国在日后的国际事务中,开始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现实影响。一方面,管仲促使齐桓公在政治上以“尊王”为号召,存邢救卫,会盟诸侯,重建稳定的政治秩序;另一方面,管仲辅佐齐桓公拒楚攘夷,安定同盟之国,护卫华夏文化,由此建立“匡天下”的政治伟业。对管仲在齐国史上的这种特殊作用,《淮南子》由衷称扬,认为虽然“景、桓公臣管晏,位尊也”(《主术训》),但如若其不能“举贤以立功”(《泰族训》),识拔和任用管仲,使其“立齐国之政”,则根本无法“九合诸侯,一匡天下”。换言之,正因为桓、管之间“上下同心,君臣辑睦”(《本经训》),所以才能促使齐国率先成为春秋时期的强国,达到前所未有的政治巅峰。

最后,对管仲身上丰富的政治文化内蕴,《淮南子》有着多重认识。

作为春秋之际著名的政治家,在秦汉思想史上,管仲时常被人论及,并被赋予丰富的政治意蕴,逐渐形成特定的文化形象,这在《淮南子》中便有所反映。若论朋友之谊,“无管仲、鲍叔以为臣,故有豫让之功”(《道应训》),正因为有鲍叔牙的相知之情、推荐之恩,管仲才能在政治逆境中化险为夷,有幸治齐;若论君臣之遇,“管夷吾、百里奚经而成之,齐桓、秦穆受而听之”(《繆称训》),如无齐桓公尽释前嫌、宽怀用贤之举,管仲也难以施展才干,达成抱负,而且“执术而御之,则管、晏之智尽矣”(《主术训》),在《淮南子》看来,桓公之所以能任管仲以治国,这也体现出为君之术的重要性;若论生平所为,“管子文锦也,虽丑登庙”(《繆称训》),“从伯夷视管、晏,则贪矣”(《齐俗训》),管仲因生活僭奢,曾引起众多批评,被视为大节小疵,由此可见,在秦汉政治文化中,管仲身为治齐之能臣,春秋之贤相,已成为意蕴丰富的历史人物,其政治生涯为人们所乐道,并惯以之为政治论说的题材。

简言之,管仲之于《淮南子》,可谓为臣之政治典范,堪称“贤相”楷模。其远大的政治抱负,卓越的政治才能,以及文化形象中丰富的政治意蕴,均为

《淮南子》所欣赏。

三、论“管”之思

《淮南子》论管,立足于黄老思想,这在西汉前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。作为一部王者之书,《淮南子》尤重“治道”探索,注重对先秦政治史的反思与总结,试图从中寻求西汉王朝的善治之路。在《淮南子》看来,管仲辅佐桓公“九合诸侯,一匡天下”,代表着春秋时期齐国政治的历史辉煌,煊赫一时,其成功经验极为值得镜鉴。因此,《淮南子》论管,重在以黄老政治精神,肯定和称扬管仲安民兴齐的“贤相”才能,而非苛求其为道德化“圣人”,这同先秦儒、法家之论管既有所同,也都有所异。

从孔子以来,儒家在政治上强调“礼治”与“德治”,认为统治者应修身为本,守礼为要,能推动王朝发展走向理想的仁义政治。因此,在评价现实中的政治人物时,儒家时常以“礼”、“德”论之,虽重视其实际的政治才干与成就,但却易于求全责备,追求道德完善,对管仲而言,即是如此。

一方面,儒家对管仲的政治才干与功绩都有着积极评价。孔子曾言:“桓公九合诸侯,不以兵车,管仲之力也”(《论语·宪问》)^{[3]982},“管仲相桓公,霸诸侯,一匡天下,民到于今受其赐。微管仲,吾其被发左衽矣”(《论语·宪问》)^{[3]989},甚至以“仁”论管,赞扬“(管仲)人也,夺伯氏骍邑三百,饭疏食,没齿,无怨言”(《论语·宪问》)^{[3]963}。孟子亦言:“管仲以其君霸”,“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,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,功烈如彼其卑也”(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)^{[4]175}。与孔、孟相近,荀子认为:“夫齐桓公有天下之大节焉,夫孰能亡之?倏然见管仲之能足以托国也,是天下之大知也”(《荀子·仲尼篇》)^{[5]106},“桓公之于管仲也,国事无所往而不用,知所利也”(《荀子·君子篇》)^{[5]452-453},对管仲在齐国政治中的特殊作用及地位同样给予高度肯定。

但另一方面,基于“礼治”与“德治”思想,儒家对管仲又有所指责和批评,认为其虽然是杰出的政治家,但与儒家之“圣人”标准还存在很大差距。当弟子问及管仲时,孔子慨叹:“管仲之器小哉”,认为:“邦君树塞门,管氏亦树塞门。邦君为两君之好,有反坫,管氏亦有反坫。管氏而知礼,孰不知礼”(《论语·八佾》)^{[3]206-212},认为管仲修身有失,违反礼制,进行严厉批评。在孟子眼中,管仲虽是齐国之能臣,受到桓公信任,但仍非其所理想的政治家,

所以面对公孙丑问“夫子当路于齐,管仲、晏子之功,可复许乎”时,孟子反问道:“管仲,曾西之所不为也,而子为我愿之乎?”(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)^{[4]173-175}与孟子相较,荀子对管仲的批评更为显然,认为:“管仲为政者也,未及修礼也”(《荀子·王制》)^{[5]153},因此虽然“齐之管仲,晋之咎犯,楚之孙叔敖,可谓功臣矣”,但却并非如“殷之伊尹,周之太公,可谓圣臣矣”(《荀子·臣道》)^{[5]249}。更有甚者,荀子站在儒家仁义立场上,明言:“管仲之为人,力功不力义,力知不力仁,野人也,不可为天子大夫”(《荀子·大略》)^{[5]500}。由此可见,对管仲的历史评价,先秦儒家存在着双重性,既积极肯定其尊君强齐的政治才能与成就,但又认为其政治实践缺乏儒家礼、仁内涵,无法成为儒家化的理想政治家。

不同于儒家的思想认识,法家对管仲则表现出极大推重,强调其政治实践的事功性,且并不以道德礼制进行苛责。“管夷吾实贤而鲁囚之。”(《韩非子·难言》)^{[6]22}韩非认为,管仲之所以会“束缚”而受辱,实乃由于“君不明也”。“昔者齐桓公九合诸侯,一匡天下,为五伯长,管仲佐之”,正因为桓公能慧眼识人,任用管仲以治齐,所以最终才能“兵横行天下,为五伯长”(《韩非子·十过》)^{[6]73-74},成为齐国史上的贤明之君。而且,从“治国之有法术赏罚,犹若陆行之有犀车良马也,水行之有轻舟便楫也,乘之者遂得其成”的法家思想出发,韩非甚至将“管仲之所以治齐”与“商君之所以强秦也”并提,认为管仲是“有术者之为人臣也”,能在政治上“得效度数之言,上明主法,下困奸臣,以尊主安国者也”(《韩非子·奸劫弑臣》)^{[6]99-105}。在很大程度上,管仲之于韩非,已被视为理想的法家化政治家,能“明於霸王之术,察於治强之数,而不以牵於世俗之言”,最终促使桓公“立为五霸主,九合诸侯,一匡天下”。与此相反,韩非激烈批评儒家所重之“伯夷叔齐”,认为“若此臣,不畏重诛,不利重赏,不可以罚禁也,不可以赏使也,此之谓无益之臣也”(《韩非子·奸劫弑臣》)^{[6]106},根本无法同管仲相比。

《淮南子》论“管”,和儒、法两家都存在一定的异、同之处。若就相同而言,对管仲佐桓公、兴齐国、合诸侯、匡天下的政治功绩,《淮南子》与儒、法家皆持积极肯定的历史态度,认为管仲确实极具治国之雄才,确为政治伟人。但《淮南子》与后者的差异也显而易见。一方面,不同于儒家,《淮南子》基于黄老道家,论“管”重在“求治”之功,并不以礼、仁政治

来要求和衡量。而且,《淮南子》明确认为管仲是“贤相”,其治齐实践甚可为师法。另一方面,也异于法家,《淮南子》没有将管仲视为法家化的政治家,并不凸显其政治实践所具有的法术内涵,更不会将其与商鞅相较。在《淮南子》看来,“今若夫申、韩、商鞅之为治也,捽拔其根,芜弃其本,而不穷究其所由生,何以至此也。凿五刑,为刻削,乃背道德之本,而争于锥刀之末,斩艾百姓,殫尽太半,而忻忻然常自以为治,是犹抱薪而救火,凿窦而出水”(《览冥训》),正因商鞅治秦不顾民众所需,蔑视民力,只知任法滥刑,所以才导致“令苛者民乱”,“商鞅立法而支解”(《繆称训》)的悲惨结局。由此,《淮南子》认为管仲根本不同于商鞅,“三代种德而王,齐桓继绝而霸”,如果说管仲治齐,值得借鉴的是积极经验,那商鞅治秦则完全相反,只是“树黍者不获稷,树怨者无报德”(《人间训》)的历史教训。也就是说,《淮南子》始终认为,管仲兴齐具有内在的政治正义性,能推动齐国政治获得民众支持,走向良性发展,故“齐国遵其政,常强于诸侯”^{[2]2134},而商鞅强秦,虐民为务,其效果必然难以长久。

综上所述,作为“汉初政治思想的理论总结”,《淮南子》“集黄老道家之大成”^[7],试图以此为基础,反思与总结先秦政治史上管仲兴齐的成功经验,从中探求西汉王朝之“治道”,进而推动其稳定发展,实现强盛。在《淮南子》而言,管仲不仅与百里

奚、子产等一样都是治国之能臣,“贤相”之楷模,而且也与孔子、墨子等相仿,称得上是忧天下之患,兴天下之利的“圣人”,因此管仲兴齐的政治实践及经验,值得西汉王朝积极借鉴和效法,而管仲之类的政治家,也值得西汉统治者主动发现、赏识和信任。应该说,《淮南子》对管仲这种由衷的肯定和推崇,既彰显出其强烈的“求治”意识,也再次凸显出管仲在先秦政治史上的重要影响。而且,其基于黄老道家的论“管”之言,在秦汉思想史上独具特色,体现出一定的代表性,这对我们今天重新审思历史上“中国最大之政治家”,“学术思想界之巨子”^[8]的管仲,当能有所裨益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何宁. 淮南子集释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98.
- [2] 司马迁. 史记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59.
- [3] 程树德. 论语集释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90.
- [4] 焦循. 孟子正义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87.
- [5] 王先谦. 荀子集释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88.
- [6] 王先慎. 韩非子集解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98.
- [7] 熊铁基. 秦汉新道家[M]. 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1:329-335.
- [8] 梁启超.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八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89:1-7.

责任编辑:汪频高

(E-mail:luckywpg@sina.com)